

北京图书馆藏宋版书叙录（十二）

李致忠

《新定三礼图集注》二十卷 宋 聂崇义 撰 宋 淳熙二年（1175）镇江府学刻公文纸印本 钱谦益跋 每半叶十六行，行二十六、七字不等，白口，左右双边。

聂崇义，五代至宋时人，原籍河南洛阳。少举三礼，精善礼学，熟通经旨。五代后汉乾祐中（948—950），累官至国子《礼记》博士，校定《公羊春秋》，刊板于国学。至后周显德中（954—959），又累迁国子司业兼太常博士。关于他编纂《三礼图》的缘起，修撰过程，成书颇末，历来评价史载大同而小异。

《宋史·聂崇义传》谓：“先是，世宗以郊庙祭器止由有司相承制造，年代浸久，无所规式，乃命崇义检讨摹画以闻。四年，崇义上之，乃命有司别造焉。……终从崇义之议。未几，世宗诏崇义参订郊庙祭玉，又诏翰林学士窦俨统领之。崇义因取《三礼图》再加考正，建隆三年四月表上之，俨为序。太祖览而嘉之，诏曰：‘礼器礼图相承传用，浸历年礼，宁免差违！聂崇义兴事国瘁，服膺儒业，计寻故实，刊正疑讹，奉职效官，有足嘉者，崇义宜量与酬奖。所进《三礼图》，宜令太子詹事尹拙集儒学三、五人，更同参议，所冀精详。苟有异同，善为商确。’五月，赐崇义紫袍犀带银器缙帛以奖之。拙多所驳正，崇义复引经以释之，悉以下工部尚书窦仪，俾之裁定。仪上奏曰：‘伏以圣人制礼，垂之无穷。儒者据经所传，或异年祀寝，远图绘缺。然踏驳弥深，丹青靡据。聂崇义研求师说，耽味礼经，较于旧图，良有

新意，尹拙受承制旨，能馨所闻。尹拙驳议及聂崇义答义各四卷，臣再加详阅，随而裁置，率用增损，列于注释，共分为十五卷以闻。’诏颁行之。……崇义卒，《三礼图》遂行于世，并画于国子监讲堂之壁。崇义为学官兼掌礼仪仅二十年，世推其该博。”这段记载显然是说，五代后周世宗柴荣以郊庙祭器年代久远，有司相承仿制，无所规式，乃命聂崇义检讨摹画。显德四年（957），聂崇义奏上《三礼图》，世宗便命有司另行制造。奈有人对其中某些礼器规制提出异议，故经过一番争论，最后还是以聂崇义所论为是。不久，世宗柴荣又诏聂崇义参定郊庙祭玉，并命翰林学士窦俨统领其事。聂崇义因取前所奏进的《三礼图》再加以考正，并于北宋太祖建隆三年（962）表上之，窦俨为此书作序，还得到了宋太祖赵匡胤的表彰与奖励，与此同时，又请太子詹事尹拙邀集儒学三、五人，更同参议。尹拙又有所驳正，聂崇义便再次引经以释之。而后又将《三礼图》，连同尹拙驳议，聂崇义答义，一同下工部尚书窦仪，令其予以裁定，最后下诏颁行。

窦俨序谓：“昔者秦始皇之重法术，而天下重刑名；魏文帝之恶方严，而人间尚通变。上之化下，下必从焉。是以双剑崇节，飞白成俗，挟琴饰容，赴曲增扑，自然之道也。周世宗暨今皇帝，恢尧舜之典则，总夏商之礼交，思隆大猷，崇正旧物，仪形作范，旁诏四方。恨近代以来不能慕远，无所釐革，溺于因循。传积世之渐讹，为千载之绝轨。去圣辽复，名实谬乖；朱紫混淆，郑雅交杂，痛心疾首。求以正之，而名儒响风，适其所愿。国子司业兼太常博士聂崇义，垂髫之岁，笃志于《礼》。

《礼经》之内，游刃其间。每谓《春秋》不经，仲尼耻是，《关雎》既乱，师挚悯之。今吉凶之容，礼乐之器，制度舛误，失之甚焉。施之于家犹曰不可，朝廷之大，宁容滥渎！御名欲正失于得，返邪于正，潜访同志，定其礼图。而所学有浅深，所见有差

异。作舍道侧，三年不成，众口云云，何所不至！会国朝创制彝器，迫于车服，乃究其轨量，亲自规模，举之措之，或沿或革，从理以变，惟适其本，时之学者晓然服之。于是博采三礼旧图，凡得六本，大同小异，其犹面焉。至当归一之言，岂容为是！吾谁适从之叹，盖起于斯，何以光隆于一时，垂裕于千古。遂鑽研寻绎，推较详求。原始以要终，体本以正末，躬命绩素，不差毫厘。率文而行，恐迷其形范；以图为正，则应若官商，凡旧图之是者，则率由旧章。顺考古典，否者则当理弹射，以实裁量；通者则惠朔用其互闻。以望存其两说，非其学无以臻其极，非其明无以宣其象。遵其文，译其器，文象推合，略无差较。作程立制，昭示无穷。匪哲匪勤，理无攸济。既勤且哲，何滞不通？有以见临事尽心，当官御物。官不同事，人不同能，得其能则成，失其能则败，礼图至此，能事尽焉。国之礼事之体既尽美矣，物之纪文之理又尽善矣。其《新图》凡二十卷，附于古今通礼之中。是书纂述之初，诏俨总领其事，故作序焉。”

竈俨是工部尚书竈仪的弟弟，字望之。幼能属文，性夷旷，好贤乐善，于昆弟中尤虽才俊。五代后晋时登进士，后周显德中（954—959）拜翰林学士，判太常寺。曾受诏考正雅乐。至北宋初转礼部侍郎，当时的礼事乐章、宗庙谥号，多由他撰定。可见竈俨也是一位长于礼学的古人。当后周世宗柴荣诏聂崇义参定郊庙祭玉，纂修《三礼图》的过程中，又派竈俨总领其事，这就是很自然很可以理解的事情了。竈俨由于身莅其事，故述其编纂颠末尤详。由于周世宗与的编纂取舍原则做了交待。

晁公武《郡斋读书志》著录有《三礼图》二十卷，并称：“右聂崇义周世宗时被旨纂辑。以郑康成、阮谿等六家图刊定。皇朝建隆二年奏之，赐紫绶犀带，奖其志学。竈俨为之序，有云‘周世宗暨今皇帝，恢尧舜之典则，总夏商之礼文，’命崇义著此书。不以世代迁改有所抑扬近古云。”

陈振孙《直斋书录解题》亦著录“《三礼图》二十卷，国子司业太常博士河南聂崇义撰。自周显德中受诏，”至建隆二年奏之。盖用旧图六本参定，故题‘集注’。诏国学图于宣王殿后北轩之屋壁，至道中改作于论堂之上，以版代壁。判监李至为之记。吾乡郡庠安定胡先生所创论堂绘《三礼图》，当是依仿京监。嘉熙戊戌风水，堂坏，今不存矣。”

这两书的著录，都谈到聂崇义纂修《三礼图》所据共有六个传本。而并于这六个传本。《四库全书总目》阐述较详。谓：“考礼图，恬于后汉侍中阮谿。其后有梁正者题谿《图》云：‘陈留阮士信授学于颖川蔡母君，取其说为《图》三卷，多不按礼文，而引汉事与郑君之文，违错正称’。《隋书经籍志》列郑玄及阮谿等《三礼图》九卷。《唐书·艺文志》有夏侯伏朗《三礼图》十二卷，张镒《二礼图》九卷。《崇文总目》有梁正《三礼图》九卷。《宋史》载吏部尚书张昭等奏云：‘四部书目内有《三礼图》十二卷，是开皇中敕礼部修撰。’其《图》第一第二题云梁氏，第十后题云郑氏。今书府有《三礼图》，亦题梁氏、郑氏。则所谓六本者，郑玄一，阮谿二，夏侯伏朗三，张镒四，梁正五，开皇所撰六也。然堪验郑志，玄实未尝为图，殆习郑氏学者作图，归之郑氏欤！”

从上面的记载、著录、序、跋看，聂崇义《三礼图》的修撰大体可以作为下的概括。由于聂崇义少举三礼，善礼学，通经旨，故于五代后周显德三年（956），奉敕检讨摹画郊庙祭器，命有司依照别造。不久，又奉诏参定郊庙祭玉，因而参考礼书郑玄旧注、阮谿《三礼图》、夏侯伏朗《三礼图》、张镒《二礼图》、梁正《三礼图》及开皇敕撰礼图，博采众家，参以己意，以成《三礼图集注》，于北宋太祖建隆三年（962）表上之。中间计寻故实，刊正疑讹，耽味礼经，服膺儒业，长达七年之久。故于表进之后，深得宋太祖赵匡胤的赞赏，赐崇义紫袍犀带，银

器缙帛以奖之。并且非但颁行朝野，还将《三礼图》绘于国子监之论堂。世亦推其该博。

此书宋刻传本极罕，今北京图书馆所藏宋淳熙二年（1175）镇江府学刻本，似是海内仅存的宋刻本。此本序文首行顶格镌“新定三礼图序”，二行低二格镌“通议大夫国子司业兼太常博士柱国赐紫金鱼袋臣聂崇义集注，”三行以下均顶格镌印序文。与序文不隔行，便顶格镌“新定三礼冕服图卷第一，”次行便开列本卷图名，之后便是礼图，形式有右图左文，正图下文。全书皮纸印造，字体近欧，刀法严整，线条流畅，显系宋刻之上乘。

卷二十后镌有淳熙乙未（二年）闰月三日陈伯广刻书跋。谓：“《三礼图》始熊君子复得蜀本欲以刻于学而予至，因属予刻之。予观其图度，未必尽如古昔。苟得而考之，不犹愈于求诸野乎！淳熙乙未闰月三日永嘉陈伯广书。”这段话的意思是说熊君子复曾得一蜀中刻本聂崇义《三礼图集注》，想在镇江府学刊印。正在这时，陈伯广来任镇江府学学正，因嘱托陈伯广主持刻印此书。陈伯广观此书图度未必尽为古昔，然若刊印出来以资考镜，比重新蒐求故实，考诸四散要方便得多，因而开板镌印于镇江府学。可见此刻的祖本是蜀中刊本。

考熊君子复，就是熊克，明万历时纂修的《镇江府志》卷十六“宋教授，学正教谕附”栏内记有“熊克字子复，建安人。乾道八年任。集开宝以来诗文二十卷，又补《丹阳类稿》所遗八十余篇，为《京口集》。”可见熊克来任镇江学官的过程中，是十分重视文化和地方艺文的蒐集的。以为此志趣而得蜀本《三礼图集注》，“欲以刻于学”，便是可以理解的事情了。

乾道八年（1172），熊克来任镇江府学，越一年，至淳熙元年（1174），便有王康来任镇江府学学正。正淳熙二年（1175）陈伯广便来接替了王康。陈伯广之后是杨大法。可见至淳熙二年，熊克还未离开镇江地面，因将自己未竟的事业，即刊印《三

礼图集注》之事托付给了陈伯广。陈伯广虽然认为此书图度未必尽如古昔，但仍足资考镜，故于镇江府学刊板流布。因而此书的版刻应著录为“南宋淳熙二年（1175）陈伯广镇江府学刻公文纸印本。”

所谓公文纸，就是以废弃的公牋，档册，反转过来，以无字的背面印制书籍。此书纸背公文有淳熙五年（1178）镇江府学教授徐端卿、中奉大夫充徽猷阁待制知镇江府司马笈衔名。因知此书之刻虽在淳熙二年，然其印制则当在淳熙五年之后了。至于后到什么时候，这就难以稽考了。

此本卷末有钱谦益手跋，称：“宋显德中聂崇义《新定三礼图》二十卷，援据经典，考释文象，由唐虞讫建隆，灿然可徵。然如尊彝图中牺象二尊，并图阮氏、郑氏二义，而不主王肃之说。是时齐子尾送女之罍已出地中，而聂氏考犹未覈。南宋人谓‘观其图度，未必尽为古昔’，有繇然也。此等书经宋人考定，其图象皆躬命绩素，不失毫发。近代雕本，传写讹谬，都不足观。余旧藏本出史明古家。遵王此本有俞贞木图记，先辈名儒，汲古嗜学，其流风可想也。辛丑夏四月四日蒙叟谦益书于城北之胎仙阁。”这里的辛丑，当指顺治十八年（1661）的辛丑。钱谦益是明末清初的藏书大家，眼界宽阔，插架宏富。他认为“此等书经宋人考定，其图象皆躬命绩素，不失毫发。”而“近代雕本，传写讹谬，都不足观。”以钱谦益的此等评论，来谛审北京图书馆所藏宋刻此书，其礼图格局，各图结构，造型体制，线条花纹，刀法墨色等，确实是都很考究。钱谦益当年曾藏有此本，今早已不在天垠间。北京图书馆所藏钱谦益手跋此本，乃钱曾述古堂旧物。钱曾少受学于钱谦益，谓能绍其绪。钱谦益绛云楼遭回禄之后，其烬余书籍及诗文稿悉付其弃藏。辛丑暮春，钱谦益曾过钱曾述古堂，观宋刻各书，缥青介朱，装潢精緻，谓殆可当绛云楼之什三。上述钱谦益手跋，便是他这次过述古堂观宋刻各

书时写下的。

此书各卷钤有：“俞贞木、”“立庵图书”、“沧苇”、“季印振宜”、“徐健菴”、“乾学”、“杨绍和曾敬观天禄琳琅秘籍”、“彦合珍玩”、“敬心老人”、“东郡宋存书室珍藏”、“宋存书室”、“周暹”等印记，表明此书曾先后曾先后经俞贞木、季振宜、徐乾学、杨氏海源阁、周叔弢自庄严堪递藏，最后归入北京图书馆。

俞贞木初名桢，以字行，号立庵，又称洞庭外史。修身砥行，绩学能文。明洪武中尝官乐昌、都昌二县县丞。名门俞石碯之孙。石碯名俞琰，字玉吾，家洞庭之西山。宋宝祐间（1253—1258），阮菊存、马性斋、王都中皆白首北面，称其为石碯先生。石碯先生的儿子名俞仲温，字子玉，元时曾为平江医学录。俞琰入元不仕，隐居吴之南园。老屋数椽，古书金石充牣其中。传四世皆读书修行，号称南园俞氏。此书钤有“立庵图书”、“俞贞木”等印记，说一定就是俞氏旧藏，明初仍为贞木所珍爱。故钱谦益跋称“先辈名儒，汲古嗜学，其流风可想也。”足见此本的确是流传有自。清初又先后为钱曾、季振宜、徐乾学所珍藏，亦都是达官显宦之人。后入山东聊城杨氏海源阁，民国初年流入天津，为周叔弢先生所得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周先生率先垂范，慷慨捐书，此本随之进入北京图书馆。现此书完美如初，是治礼者不可多得的传本。

《四书章句集注》二十八卷 宋朱熹撰 其中《论语集注》十卷《序说》一卷，《孟子集注》十四卷《序说》一卷，宋嘉定十年（1217）当涂郡斋刻 嘉熙四年（1240）淳祐八年（1248）十二年（1252）递修本；《中庸章句》一卷，《大学章句》一卷，宋淳祐十二年（1252）当涂郡斋刻本。每半叶八行，行十五字，小字双行同，白口，左右双边。其中有少叶抄配。

朱熹字元晦，一字仲晦，号晦庵，别号紫阳。徽州婺源（今

属江西)人,侨寓建阳(今属福建)。生于南宋高宗建炎四年(1130),卒于南宋宁宗庆元六年(1200),享年七十岁。朱熹生活的时代,正是南宋前半期的所谓中兴时代。曾任秘阁修撰等职。政治上主张抗金,并强调充分准备。早年曾师事李侗,是程颢、程颐的四传弟子,在哲学上发展了二程关于理气关系的学说,建立了一个完整的客观唯心主义的理学体系,成为理学的集大成者,世称“程朱学派。”他的理学在明清两代被尊为儒学正宗的地位,影响极其深远。朱熹一生从教五十余年,对经学、史学、文学、乐律,乃至自然科学,都有不同程度的贡献。博及群书,广注典籍,如《周易本义》、《诗集传》、《楚辞集注》等。《四书章句集注》,则是他所注释的儒家经典之一,影响极大。

所谓《四书》,是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、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的合称。《论语》在唐以前已成为十二经之一。宋代以《孟子》升经,十三经由此定型。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原来都是《礼记》中的篇章,《礼记》早就是经书,由其中析出的《大学》与《中庸》,当然也是儒家经典之一。为与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相配合,朱熹于南宋淳熙间(1174—1189)为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、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统撰《四书章句集注》,“四书”之名始立。自此之后,《四书》长期成为封建社会科举取士初级课读的标准书。

所谓章句,原指章节与句子的合称。《文心雕龙·章句篇》谓:“夫人之立言,因字而生句,积句而为章,积章而成篇。”足见章是文章的段落,句是文章中最基本的语义构成条件。根据文章中每句每段的内在含义加以铨释,就称为章句之学。在汉代,由于注家多以分章析句来解说古书的意义,于是便形成了一种流行的著作体。如王逸的《楚辞章句》,《春秋》《公羊章句》、《穀梁章句》,《书》欧阳章句、大小夏侯章句等,就都

是这种体材的著作。

宋以前，《五经》立于学官，唐代孔颖达奉敕领衔校定的《五经正义》，是官定经书注释。入宋之后，程、朱先后尊崇《大学》，奉如“初学入德之门”；尊崇《中庸》，奉为“孔门传授心法”。因将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与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相配，为之作注，使之与《五经》并列，“四书”、“五经”之称便由此始。朱熹为《论语》作集注和为《孟子》作集注，大约成书在南宋孝宗淳熙四年（1177），多引用二程及程门弟子的铨解加以注释。为《大学》作章句和为《中庸》作章句，均成为在孝宗淳熙十六年（1189），基本上是自己的注释。光宗绍熙元年（1190），也就是在朱熹完成《大学章句》和《中庸章句》的第二年，他官知漳州，在漳州便首次刊印了《四书章句集注》，从此“四书”之名正式确立，迄今正历八百年。

八百年来，《四书章句集注》的版本极多。但传世最早的刊本，当推北京图书馆所藏南宋嘉定十年（1217）当涂郡斋刻本。当涂郡斋开版雕造《四书章句集注》，比朱熹在漳州刊印此书仅晚二十七年。当时祖本犹存，校堪有据，堪称善本。特别是当此书其他宋本均已失传的情况下，此本就更加显得珍贵了。

此本为每半叶八行，行十五字，可谓行格疏朗，字大如钱。特别是此书的经文与注文，字体一样大小，这在宋刻经书中是仅见的。《大学章句》卷尾镌：“从政郎提领江淮茶盐所准备差遣刘梦高校正”校堪官衔名一行。又镌淳祐壬子（十二年1252）金华马光祖刻书题跋一篇。跋谓：“当涂郡斋旧有文公《语》、《孟》集注，注与本文皆大字，于老眼为宜，盖正肃吴公所刊，见谓善本。□光应竭来攸守，依仿规制，取《中庸》、《大学》章句并刊之，足成‘四书’。《语》、《孟》岁月浸久，间有漫灭，就加整治。是书在天地间无穷达，老少皆不可一日废。熟读玩味，则施之行事，其有不敬且畏哉！淳祐壬子孟秋朔旦金华马

光祖敬识。”

关于马光祖的行实传记记载较多,《宋史》卷四一六有传。综合这些传记资料,可知马光祖字华父,一字实夫,号裕斋。马之纯之孙,金华人。宝庆二年(1226)进士,调新喻主簿,已有能名。从真德秀学,改知馀干县,差知高邮军……进直徽猷阁,江西转运副使,兼知隆兴府。以右正言刘汉弼言罢。后九年,起直徽猷阁,知太平府……累迁户部尚书,兼知临安府。历陈京师粮食和籴增价、海盗致寇三害。为汉东安抚使,知建康府,减租税,养鰥寡孤疾,辟召僚属,皆极一时之选。咸淳中(1265—1274)历官和枢察院事,兼参知政事,以金紫光禄大夫致仕,卒谥庄敏。我们从这段文字中可知马光祖曾知太平府。

考太平府,五代南唐保大末年置新和州,不久改为雄远军。宋改曰平南军,升为太平州。元为太平路,明为太平府,清因之。属今安徽省,故治即当涂县。检康熙时纂修的《太平府志》,知马光祖在淳祐十二年(壬子)曾以朝清大夫直徽猷阁,知太平州。这就证明马光祖在淳祐十二年的确在当涂做过官。跋中所谓“依仿规制,取《中庸》、《大学》章句并刊之,足成‘四书’”之语,就是极为可信的了。跋中还谓“当涂郡斋旧有文公《语》、《孟》集注,注与本文皆大字,于老眼为宜,盖正肃吴公所刊,见为善本。”以此语与北京图书馆所藏相勘,确是本文与注文字体一样大小,信即马光祖所言当涂郡斋旧有者。且推断为正肃吴公所刊,到马光祖来知太平州时,已被视为善本了。

然正肃吴公究竟是谁呢?正肃一定是吴公的谥号,重要的是要考证出吴公的真实姓名及其行实履历,然后才能确定他到底刻过此书没有。《宋史》卷四〇〇有吴柔胜传,谓“吴柔胜字胜之,宣州人。幼听其父讲伊洛书,已知有持敬之学。不妄言笑,长游郡泮,人皆惮其方严。登淳熙八年进士第,调都昌簿。丞相赵汝愚知其贤,差嘉兴府学教授。将真之馆阁,会汝愚去,御史汤硕劾

柔胜。尝救荒浙右，擅放田租，为汝愚收人心。且主朱熹之学，不可为师儒官，自是闲居十余年。嘉定初主管刑、工部架阁文字，迁国子正。柔胜始以朱熹《四书》与诸生诵习讲义。策问，皆以是为先。……改知太平州，除直秘阁，主管亳州明道宫，改直华文阁，除工部郎中，力辞。除秘阁修撰，依旧官观以卒，谥正肃。”可证“正肃吴公”实际指的就是吴柔胜。

这段记载还提供了三方面的信息：一是吴柔胜主朱熹之学，宗朱熹之说；二是吴柔胜以朱熹《四书》与诸生诵习讲义，皇帝策问，皆以是为先。这两条说明，吴柔胜是尊崇朱熹的，对朱熹集注的《四书》更加推崇备至。即不但以《四书》教习生徒，皇帝策问，亦以《四书》为对。这是他刻印朱熹《四书章句集注》的思想背景。三是吴柔胜曾知太平州，这是他于当涂郡斋刻印朱熹《四书章句集注》的客观条件。考康熙时纂修的《太平府志》，其“名宦传”中记载“吴柔胜嘉定十年以朝奉郎知太平州，次年转朝散郎直华文阁，谥正肃。”证明嘉定十年（1217）吴柔胜确曾在当涂做官。官思想上推崇，课徒中使用的《四书章句集注》，待到他来当涂做官，主持刻印于当涂郡斋，则是完全可信的。马光祖跋文中所谓“盖正肃吴公所刊”之语，当不属诬说。所谓当涂郡斋，指的就是当涂县的县学。据乾隆时纂修的《当涂县志》卷十二记载，“县儒学在县治东南，直龙津门，水、丰二仓址，故宋绍兴郡学地。”七百多年前，吴柔胜主持刊印的《四书章句集注》，就在这里问世发行。

盖版行之后，刷印频繁，故不久便有漫漶分缺版现象发生，再印时只好修补才能施行，今此书版口有“重换”、“换板”、“重刊”字样可证。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、出口镌有“庚子重换”、“庚子重刊”、“戊申重刊”、“壬子换”、“壬子重刊”、“壬子换板”等字样，表明此本迭经递修。考庚子，当为嘉熙四年（1240），距开板二十三年，再印时已有补修。戊申当

为淳祐八年（1248），距开板三十一年，再印时又有补修。壬子是淳祐十二年（1252），距开板三十五年，距嘉熙庚子重修十二年，距淳祐戊申重修仅有四年，可见书版在逐年损坏。北京图书馆所藏《论语集注》和《孟子集注》就是这种递修本。所以其版本应著录为南宋嘉定十年（1217）吴柔胜当涂郡斋刻嘉熙四年（1240）淳祐八年（1248）十二年（1252）递修马光祖淳祐十二年（1252）重印本。

至于《大学章句》、《中庸章句》，到马光祖来官当涂县时，盖版已全毁。故马光祖才跋称“当涂郡斋旧有文公《语》、《孟》集注，注文与本文皆大字。”正因为没有了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的旧板，马光祖才“依仿规制，取《中庸》、《大学》章句并刊之，足成‘四书。’”所以《大学章句》与《中庸章句》的版本应著录为“南宋淳祐十二年（1252）马光祖当涂郡斋刻本。”与前两书虽非出于一时一人之手，但版式行款则完全一样。若不细审，则宛若同槧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北京图书馆

（本文责任编辑：曹月堂）